

对话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研究生培养缺乏“结构调整”

■本报记者 温才妃

尽管当前去行政化遇到了很多现实的阻力,但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让教育回归到教育本身,少一些行政干预的方向必须明确。

在大众教育时代,一些本科毕业生将读研变成了“学士后”教育,意图通过读研“镀金”,以谋求更好的就业机会,这一现象反映在研究生层面,就是教育没有为培养研究型人才作好准备,功利思想的延续也使得博士生教育出现了短、平、快现象。

产生恶性循环的原因是综合的。从教育层面找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认为,制度的严重滞后是导致研究生质量整体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借用经济学的概念,“当前的高等教育仅在增量上下功夫,通过资金的投入,在增量上获得产出,却很少进行结构调整”。

从文科硕士培养看教育改革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文科硕士培养,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许纪霖:从文科硕士的情况来看,硕士基本上无法从事研究性质的工作,几乎都要等到博士毕业才能从事研究,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如今国内的文科专业,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攻读。相比较国外读研、读博的辛苦,中国学生过于轻松——大部分时间在听教师讲解,结合课程的阅读量太小,甚至很多课程还不写论文,学生们一个个坐在课堂就像是“南郭先生”,不开口不说话,结业时交一份不用认真思考、打提纲、导师过

目的作业就通过了。
目前,国家在推进专业硕士改革,但同时还应该考虑把学术型硕士减少后,要注重其同博士培养挂钩。
《中国科学报》:研究生培养强度不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许纪霖:国内大学在研究生培养的传统上存在问题。大学对本科生教育有严格的制度,但到研究生阶段,一些导师获得了更大自主权,反而不上心。这和只重视科研不重视教学的评价体系密切相关,一些导师人为在学生身上花了心思,学生不会说自己好,并对评职称没有帮助。只要教师的评价机制不改,研究生质量很难真正提高。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在研究生培养上,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路?
许纪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思路——鼓励学生去发SCI论文,核心论文。这种思路只要尖子生,认为只要有了钱就一定培养尖子生,严重忽视了研究生的一般教育。而在在我看来,培养一名优秀的学生应当是在良好的研究教育基础上,通过自然竞争产生,而非刺激而成。
《中国科学报》:背后反映了什么改革问题?
许纪霖:现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思路是“优胜劣汰”,顶层教育叫“赢家通吃”,底层教育叫“末位淘汰”。它认为上面拔尖,下面惩罚,问题就能

解决。实际上,采取“金钱奖励”“抽查”等方式来解决研究生培养的弊端,都是行政意志上解决问题的方式,并没有改变研究生培养的核心问题。
管控严、砸钱买效益,这是公司化的管理方式。然而教育不是工厂,科研人员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培养人才必须在创造力上下功夫。把学生的创造力激发出来,要在机制上多动脑筋,而不是把整个研究生培养绑在政绩工程上——出SCI,政绩工程很伟大;没有抄袭,政绩工程也不难看,这样做完全违背了教育本身的逻辑。
因此,尽管当前去行政化遇到了很多现实的阻力,但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让教育回归到教育本身,少一些行政干预的方向必须明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制度的改革,而不是采取今天的公司化管理、行政监督。

博士生培养亟待与国际化接轨

《中国科学报》:中国博士生培养质量不高,是由于哪些原因造成的?
许纪霖:一流大学的博士生素质相对稳定,但优秀人才难以产生。这归因于三点。
其一,博士毕业的年限太短,过去是3年,现在正常情况下是4年,如果学生博士期间出国交流,让他在正常年限中写出优秀论文为其难。
其二,大学要求博士生发表文章,甚至有些大学要求博士生在核心期刊、A类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一点连导师都不容易做到。很多大学有一半的文章出自于研究生,这就使得整个研究生教育从硕士到博士都被“绑架”到政绩工程。
其三,由于年限短、学校放水,博士生读书的强度普遍不够。美国一流名校的文科博士生未必是最聪明的,但他们通过资格考试后要选三组课程,阅读两三百本书,他们毕业后承担教学,能够真正地交给学生知识。反观国内注水、速成式的博士教育,读书强度不够,如何教育下一代?
《中国科学报》: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许纪霖:国内高校的改革可以先让一流大学与国际化接轨,从这点而言,北大、清华等“985工

程”高校应该率先试行美国式的博士生培养。
一方面,年限可以设定为5年甚至更长,有效地淘汰学术投机分子,同时加强读书强度。目前,一些高校也作了改革,如北大历史系少有4年毕业的博士,但因为国内高校普遍尚未将其制度化,社会上仍然较难接受。
另一方面,由于博士阶段的奖学金最多只给3年,改革还应该考虑到博士生的后顾之忧。如今国内也有TA(教学助理)、RA(研究助理),但前者较少,实际上本科生的讨论课堂,可交由博士生TA领导组织,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还可以为他们日后积累教学经验。
由于个人兴趣、家庭原因等问题无法忍受长时间毕业生,应为他们打通分流渠道。参照美国博士资格候选人制度,无法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者,允许他们以硕士学历毕业。同时,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者,允许他们边写论文边就业,用人单位可与之签订暂时性就业合同,拿到学位后再签正式合同。
《中国科学报》:当前博士生培养现状,提醒我们要注意什么?
许纪霖:如今的高校,院系缺少读书风气,学术风气,就像过去的科举是为了解决仕途问题,书院才是读书的清雅之地,今天的博士生课余时间很少谈学问,更多谈论的是买房、找朋友等现实问题,如果有入读书,反而会被周围人嘲笑。由于制度的问题,使得有心向学的入有压力,混的人反而如鱼得水,是教育的一大悲哀。
在学风问题上,我建议教育部下决心停招在职博士,如今的在职博士成为官员、商人混文凭的重要渠道,博士培养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被这批人带坏的。在我看来,高校可用赠送名誉博士的称号,取代给官员、商人颁发学历证书的行为,但现在主管部门并不允许这种做法。同时,还要注意区别高校在职教师解决博士资格的问题,允许他们在岗位上报考、写论文,并规定与教学研究岗位无关者,一律不允许报考在职博士。
总而言之,制度、风气是中国研究生教育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改革首先要改制度,靠打“强心针”只有暂时的威慑力,改变不了现状。

执着坚守 成就幸福人生

■宁波

担心、犹豫、彷徨、失落,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你们要善于明辨是非、果断抉择,坚守前行的方向。心浮气躁、朝三暮四,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最忌讳的,都会令人一事无成。

同学们,大学时期是奠定你们一生发展基础的关键阶段。这四年来,师长们殚精竭虑,把如何帮助你们获得更多有用的知识、如何使你们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发展,使你们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中坚和栋梁当作责任与使命。非常令人欣慰,这份付出令你们能够在大学校园里身心健康地成长。
四年里,你们长大了,更加自信了。你们掌握了未来发展的初步知识与方法,有了自己的思考,但这仅仅是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未来的道路必将漫长而充满挑战与不确定性。明天,你们又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开启新的征途。国家的安宁,社会的繁荣,乃至人类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将依靠你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与奋斗。在同学们即将启程之际,我谈几点想法与大家共勉,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伴你们一路顺利前行。
首先,你们要坚守自己的方向。今天你们当中的大部分同学已经有了心仪的工作,或者拿到了继续深造的入场券,不过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阅历的增加,你们仍将面对学业、事业、情感的选择等多方面的考量。担心、犹豫、彷徨、失落,都是正常的人生经历,你们要善于明辨是非、果断抉择,坚守前行的方向,那就是在为国家、社会和人类进步与发展作贡献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心浮气躁、朝三暮四,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最忌讳的,都会令人一事无成。
其次,你们要坚守自己的格调。进入大学,你们离开了父母的羽翼庇护;进入社会,你们将脱离学校的呵护。面对复杂的社会,我希望你们能够拥有健康良好的心态,自信自立、乐观坚韧,坚守自己独特、高雅的格调。人的一生如同大海中的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总会遇到那些那样的风雨和冲击,这时候,不要悲观,不要动摇,要淡定坚守,坦然面对,其实只需稍稍回首,你便会看到我们,你们的父母和老师,你们的母校,就在你们的身后,一直凝望着你们前进的背影。我相信那一刻,幸福定会化解你们心中的忧郁,使你们看到希望,产生勇气,乐观、坚定地前行。
前几年,我教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有所下降,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鼓励同学们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提高你们的身体素质,因为走上社会,面对逐渐加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你们需要拥有健康的体魄。身体是一个人道德、知识、才华、个性的载体,离开学校以后,希望同学们强化健康意识和锻炼意识,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从小处讲,这种健康意识与态度可以强身健体、提高个人生活质量,从大处讲,可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国民素质。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最新定义是“人的身体、精神与社会的最佳状态”。养成文明健康生活的习惯,坚守诚信、友善、博爱、悲悯等这些人类的美好品质,将使你们更好地享受生活,也将使你们有能力从容地应对一切挑战,化解一切烦恼、不幸和困难,创造一片有利于个性发展的自由天地。
再次,你们要坚守自己的底线。世间万物皆有底线,越过底线就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60万年前小行星撞击地球,越过了很多物种生存的底线,导致大量生物灭绝;适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能保护大气层,但越过底线就会产生温室效应。人类的心中也有着无形的底线,时时约束着我们的行为:生存是生命的底线,诚信是处世的底线,忠诚是爱情的底线,尊严是人格的底线……一个人一旦越出底线,思想就会蜕变,道德就会沦丧,所以我希望你们必须坚守自己的人生底线。
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当今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转型加剧,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利益观也因受到不断冲击而日益多元化。离开母校进入社会,面对无处不在的诱惑,一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你们必须坚守,这是你们安身立命的根本、维护自尊的法宝,也是整个社会健康运行、和谐运转的客观需要。人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旅程,跋涉过程中难免也会有迷茫或者失落的时候,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心中底线是摆脱迷雾的力量,是照亮前路的光芒。坚守心中的底线,你们将作出正确和无悔的选择。
最后,你们要坚守自己的诺言。能够站在今天这个人生旅程的新起点,你们一定都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并在它的指引下走到现在。不要忘记,不要放弃,坚定地从现在开始,脚踏实地地开始实现自己的理想,实践自己为家、为国、为社会努力奋斗的诺言吧。
身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新时期,作为青年一代,作为社会的精英,你们应该勇于担当、学会担当,将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奋斗目标统一起来,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付出自己的汗水、奉献自己的青春。
大学也许不是个完美的地方,但它仍然可以称作是“象牙塔”。你们即将面对的社会,远远比校园环境复杂。在那里,你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不一定都能够得到别人理解和支持,甚至可能会遇到冷漠、歧视、讽刺、打击和人为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曾经被高考证明的智商将发挥作用,你们经过大学四年锤炼的情商更将决定成败。这时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你们的执着、勇气和顽强,取决于你们坚定的信仰。即便工作和生活环境不尽如人意,也义无反顾地去努力实践你们的诺言吧!努力践行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将使你们身边的环境逐渐变得温暖、明亮,使你们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本文摘自其在2014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清理「高考加分乱象」须有治本之策

■胡乐乐

前段时间,河南杞县、通许县高考加分案件,河南、辽宁个别中学高考体育特长生加分人数过多问题引发公众持续关注。教育部下一步也将研究制定进一步减少和清理高考加分的政策,重点减少加分项目,降低加分分值,严厉打击加分资格造假。
事实上,早在6月30日,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上就发表了《教育部强调严厉打击高考加分资格造假》一文,详细介绍了高考加分的“瘦身”政策以及成效,并再次强调严厉打击高考加分造假。客观而言,虽然高考加分“瘦身”的成效显著,但事实上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也绝不容忽视。比如,虽然全国体育特长生减少了三分之一,但今年除了辽宁省和河南省的个别中学被曝高考体育加分涉嫌造假,全国其他省份也肯定或多或少存在体育加分造假,只不过目前尚未被曝光罢了。另外,更改户籍,假冒少数民族获取加分资格的漏洞是否已经堵住,教育部的该文并未提及。
毋庸讳言,目前的高考加分仍然存在许多弊端,包括有部正视的严重问题。一是包括见义勇为在内的思想品德加分需要公开、民主、科学论证;二是少数民族加分政策需要有区别性的细化,不能再全国“一刀切”;三是其他全国性和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与分值需要大削减,进一步全面“瘦身”。举例来说,在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加分一方面让一些人给考生子女更改户籍上的民族成分提供了强劲驱动力,另一方面对汉族考生形成了“反向歧视”。至于体育特长生这样的高考加分,考生是否体育特长生,以及究竟有多么特长应该完全由自主招生权的高校自行评定,而不能由报考高校之外的组织机构认定。
显然,高考加分急需进一步地强有力“瘦身”和规范。这首先要要求教育部和有关部门要正视高考加分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正当性、公平公正性和公开透明性。按理说,经过公开、民主、科学的论证后,那么没有正当性的高考加分项目就应该一律取消。对于那些虽然有正当性的高考加分项目,分值也要减少到合理的范围——一般最高不宜超过5分。对于需要细化政策的高考加分,比如少数民族加分,一方面要给力地严格防止并严惩民族成分变更造假,另一方面则要注意努力防止这一加分对汉族考生的“反向歧视”。也就是说,2015年起的高考加分,口子再也不能开这么大了,亦即高考加分必须尽快扎紧政策。否则不仅会继续严重危害高考的公平公正性,也难以向国家和高校选拔真正优秀的人才。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师)

高教视点

何为真正打破“一考定终身”

■熊丙奇

2014年高考招生一批次录取仍在进行中。据媒体了解,已有多所高校在提前批中通过“综合评价”的方式招录到了自己满意的学生。此种录取方式打破高考单一评价,成为业界所期盼的高考改革主流,有利于打破一考定终身,且近年来各地试点规模悄然扩大。
这种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且放在提前批录取的方式,确实可能成为未来推进自主招生改革高校的“主流”,但这并非业内所期盼的高考改革主流,这一改革也无法打破一考定终身。
笔者之前就对这一综合评价录取方式进行过评价,指出其安排在提前批录取,仅能对投档进该校的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因此对打破单一分数评价体系的有限,而且也很难推广。更重要的是,这一改革方式没有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很有可能成为高校抢生源的一种手段。
高考加分政策的推出,就是为“打破一考定终身”,在单一的分值评价之外,增加对学生的个性、特长评价,但众所周知,高考加分政策已经异化为加分教育和加分腐败。最近一段时间来,舆论一直呼吁取消高考加分,这种逻辑和降低高考成绩权重逻辑并不是完全矛盾吗?
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也是为“打破一考定终身”,但试点改革11年来,舆论对其的质疑越来越强烈,按照高校自主招生的操作,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有的达当地一本线即可录取,有的可以低于该校在当地的录取分20-60分录取,这从最终的录取评价看,也很大程度降低了高考成绩权重,可为何却遭遇自主招生没有打破单一分数评价体系、增加学生负担、高校在利用自主招生抢生源,以及自主招生滋生腐败的质疑呢?

和高校的自主招生改革相比,目前部分高校试点的三位一体(高考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综合评价,最终进行的评价是学校只有对达到一本投档要求,投档进本校的学生,按照学生的高考成绩、大学面试考察、中学学业成绩进行综合评价,在这样的操作中,高考成绩的作用比自主招生要求更高,整个录取的操作基本没变(自主招生要求考生把高考成绩填在自主招生批次或者第一批的第一志愿或A志愿,综合评价要求考生把高考成绩填在提前批第一志愿),怎么就变得更有价值了?
分析高考改革的实质,必须分析实质。业内期待的主流改革是考试招生分离,大学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离开了考试招生分离,在计划录取框架内的改革,价值都十分有限——学校和学生无法充分双向选择,尤其是学生的选择权没有任何增加,改革也就没有达到其目的;我国高考改革的出发点和目标只有一个,即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包括中学求学时的课程选择权、考试时的考试选择权、升大学时的学校选择权和教育选择权,上大学之后还可继续选择学校和专业。其中,扩大中学时的课程选择权,就把学生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扩大考试选择权,就把考试从行政垄断转向社会化组织,大学自主认可、考生自愿选择,扩大学校选择权,就是考生可以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再选择大学,建立学生和学校的双向选择机制,促进高等学校的竞争。
学生的选择权是否增加,是评价改革价值的唯一标准。以此分析目前的高考评价改革,具有进步价值的地方是,把综合评价放在统一高考之后进行,这可为探索基于统一测试的



高校完全自主招生积累经验,笔者多年来一直呼吁,高校自主招生可以放在高考之后,用高考成绩作为申请的依据,大学自主提出考试成绩门槛,达到要求的学生可同时申请若干所大学,大学结合高考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独立评价录取,每个学生可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再作确认。这一改革可以从目前90所试点自主招生的高校做起,如果试点成功,就可逐渐增加高校和名额,同时,在目前的统一高考基础上,再推出全国性的基本学习力能力测试,可作为高校自主招生的基础性评价依据,如此,只要稳步推进,我国高考就会形成多次考试、多次录取的全新格局,既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又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这才是真正的“打破一考定终身”。(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域外传真

澳英高教:一块份额未变的“蛋糕”

■蒂姆·皮特曼

我的一个朋友——罗恩,是英国工薪阶层移民的儿子,他是家庭里第一个在澳大利亚读大学的家庭成员。他一直认为,他所在的阶层阻碍了他回到英国读大学。但是他也发现,在澳大利亚,类似的障碍正在形成。
最近罗恩和我讨论了他的经历,并将其与现在学生作对比。罗恩强调,即使存在自身的一些问题,但是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与英国的相比,仍然是较为容易进入的。
但是他说得对吗?
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大众化的。据统计,两国的高等教育均为国家总人口的40%提供学历教育。两国都在尝试为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改善情况,帮助他们入学。
在澳大利亚,教育部门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国内16%的本地生源来自社会经济程度低的地区。而在英国,学生的所谓劣势通常以父母的职业来衡量。最近数据表明32%的全日制第一位获得者来自体力劳动背景的家庭。而以这些样本在整个国家人口中的比例来看,

关于学生背景的数据,两国的情况都是严重不对称的。也就是说,这部分人实际上的比例低于理论上应占的比例。
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学生的录取率与他们占总人口的比例相比,只有他们应得的一半。生活在乡村和偏远地区学生的大学录取率只有人口对应比例的1/3。录取率与人口比例严重不对等的还有残疾学生、非英语背景的学生以及希望以攻读学位而获取高薪职业背景的女性。
在英国,处于弱势地位的年轻人把他们的录取率乘以三,才能到达与有优势背景的年轻人相同的录取率。当然,伦敦的录取率与其他地区的录取率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就整个英国而言,威尔士的年轻人上大学录取率是最低的。而对于澳大利亚的女性来说,情况一模一样。
就目前来看,澳大利亚和英国的情况差不多。每个国家的高教体系都在继续扩张,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数量实际上一直在增长,但是与人口比例来算,这种增长却又十分缓慢。
如果把整个高等教育想象成一块蛋糕,那

么这块蛋糕的尺寸在过去这些年已经扩大了很多,但是这个派应给不同弱势学生群体的份额却没有变化。尽管高等教育已经在社会流动性方面为这一代学生作出了改善,但仍有许多情况与罗恩父母移民当年相比,没有任何改善。
也许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真正的挑战在于怎样制定更详细准确的定义,从而更好地衡量所谓“弱势”。以澳大利亚为例,用对欠发达地区进行人口普查的手段是不准确的;而在英国,伦敦由于其特殊的规模,成为统计中的“游戏改变者”——伦敦所占的资源几乎是其他地方的总和。也就是说,简单移居到伦敦就可以自动提高下一代的社会流动机会。
就目前而言,所有那些试图解决教育上的弱势问题的做法都不理想,我们还没有找到可以让每个人不用回答私人问题或那些可能衡量出其背景的侵入式问题(侵犯性问题)的替代性方案。但我们不应该就此停止努力。
(作者系科廷大学研究员,本报记者韩珉编译)